

論自由國際主義

林宗達

提 要

當代國際關係理論有兩大主流學派：一為現實主義學派；另一是自由主義學派。古典現實主義是現實主義學派之先河，而自由國際主義則是自由主義學派之開創者。儘管如此，但在國際關係學界中，亦有將自由國際主義與國際關係之自由主義學派等同視之者。正因如此，本文首先所要探討的就是自由國際主義之界定，而後再據此論述其之思想淵源，此包括道德、人性與正義觀、自由經濟與自由貿易論、權力分立之共和政體觀、自然狀態觀；其次是自由國際主義之自由貿易之國際和平論、民主政治之國際和平論、國家道德與國際正義論等三大論點。最後則是本文之結語。

關鍵字：自由主義、古典自由主義、自由國際主義、理想主義、新自由主義

現實主義學派與自由主義學派為國際關係之兩大主流理論，而自由國際主義(liberal internationalism)即為國際關係之自由主義學派之一，然亦多有學者以此學派做為國際關係之自由主義的代表。如學者John MacMillan即以自啟蒙時期之自由主義的世界觀為起點，而將此後之國際關係的自由主義，統稱為自由國際主義。¹又如學者Antonio Franceschet將自由國際主義領航者-康德(Immanuel Kant)以後之國際關係自由主義的各個學派，均稱之為自由國際主義。²至於著名的國際關係之自

由主義理論學者Michael W. Doyle，亦多以自由國際主義來涵蓋Woodrow Wilson之自由主義(理想主義)的內涵。³因此，本文首先所欲厘清者，即是國際關係之自由主義學派與自由國際主義之間的關係及其思想淵源。

另外，立足於自由國際主義進行界定與其思想淵源之探究的基礎下，本文亦要探討自由國際主義的假定與主要論點為何。最後，則是依據自由國際主義之立論而提出之相關問題與批評。

1 John MacMillan, "Liberal Internationalism," in Martin Griffiths e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An Introduc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p. 21-34.

2 Antonio Franceschet, "The Crisis of Liberal Internationalism: From International to Global Governing Institutions," *Kant and Liberal Internationalism: Sovereignty, Justice, and Global Reform*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2), pp. 85-102.

3 Michael W. Doyle, "Internationalism: Kant," *Ways of War and Peace: Realism, Liberalism, and Socialism* (New York & London: W.W. Norton & Company, 1997), pp. 258-84.

自由國際主義之界定

不似現實主義學派之各大流派的明確性，關於國際關係之自由主義理論流派的劃分，可說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專研國際關係之自由主義理論的Michael W. Doyle認為國際關係之自由主義學派至少可分成以強調民主導致和平之自由和平主義(liberal pacificism)、著重勢力擴張之自由帝國主義(liberal imperialism)以及康德以降之自由國際主義(liberal internationalism)等三者。⁴另外，學者Andrew Moravcsik則將國際關係之自由主義學派劃分為著重認同與合法社會秩序之理想的自由主義(ideational liberalism)、關注經濟資產與跨國界之經濟交易的商業自由主義(commercial liberalism)，以及專注國內代議民主政治與國際制度促進合作之共和的自由主義(republican liberalism)。⁵

再者，就對國際關係之自由主義理論學派之分類而受到更多關注之David A. Baldwin的區分而論。Baldwin認為國際關係之自由主義理論概可分四大學

派：一是將自由貿易與和平進行聯結之商業自由主義(commercial liberalism)；二為聯結民主與和平之共和自由主義(republic liberalism)；三是結合跨國互動與國際整合之社會自由主義(sociological liberalism)；四為專論國際制度與和平之自由制度主義(liberal institutionalism)。⁶基本上，如此之分類對當代興起之新自由制度主義與其與新現實主義理論之論辯，亦有可取之處。⁷儘管如此，吾人以為如此對國際關係之自由主義理論學派的劃分對研究國際關係之自由主義學派的理論，特別是對於初學者而言，並不適當。因為，上述之分類，至少有以下兩大問題：

其一，缺乏明確的發展時間脈絡與延續關係。從前述之劃分可見，吾等很難清楚地瞭解國際關係自由主義學派理論的發展時間脈絡與其延續關係。但事實上，國際關係之自由主義理論，最遠可以推算至柏拉圖(Plato)和亞里斯多德(Aristotle)，最遲至少可從十八世紀之康德以降的古典自由主義(classical liberalism)，然前述之

4 Michael W. Doyle, "Liberalism and World Politics Revisited," in Charles W. Kegley Jr. ed., *Controversi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Realism and the Neoliberalism Challenge* (New York: St. Martin Press, 1995), pp. 84-100.

5 Andrew Moravcsik, "Taking Preferences Seriously: A Liber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Oona A. Hathaway and Harold Hongju Koh eds., *Foundations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Politics* (New York: Foundation Press, 2005), pp. 85-93.

6 David A. Baldwin, "Neoliberalism, Neorealism, and World Politics," in David A. Baldwin ed., *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The Contemporary Debat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p.4.

7 盧業中，〈國際關係學之自由主義的理論〉，明居正主編，〈國際關係綜論〉（臺北：晶典文化，2010），頁94。

幾種分類，都不容易清楚地瞭解到國際關係之自由主義學派的發展時間脈絡與延續性。

其二，事實上，就包括康德等十八與十九世紀之國際關係自由主義者的相關論述而言，即已包含大部分Baldwin四大自由主義學派之主要論述內涵，故而Moravcsik和Baldwin前述之分類因其太過精細，反而忽略了十八世紀以降之國際關係自由主義學派理論的整體內涵，致使其難以做為更完整地理解十八世紀康德以降等國際關係自由主義者之理論的基礎。

就上述缺陷的問題而言，綜觀諸多國際關係對自由主義學派劃分之論，學者Timothy Dunne之區分則是與上述諸多學者之論較為不同者。Dunne認為國際關係之自由主義理論概可區分為自由國際主義(liberal internationalism)、理想主義(idealism)與自由制度主義(liberal institutionalism)等三大學派。前者之自由國際主義主要是以十八至十九世紀之間的古典自由主義者(classical liberalist)對於國際關係之論述為主，而這些學者主要有康德、邊沁(Jeremy Bentham)與Richard Cobden等；而中者之理想主義乃是以1900年代初至1930年代末之間所盛行之國際關係的自由主義者之相關論述，而美國總統Woodrow Wilson乃是最為主要的代表者；至於自由制度主義則

是以1940年代初至1960年代中期之間，國際關係之自由主義者的相關論述，在此之中，可以David Mitrany的整合理論(integration theory)為其代表。⁸然在1960年代末之後，前述國際關係之三大學派在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興起，以及受到跨國主義(transnationalism)與多元主義(pluralism)等理論之影響下，產生了回應國際關係之新情勢的新自由國際主義(neo-liberal internationalism)、新理想主義(neo-idealism)與新自由制度主義(neo-liberal institutionalism)。⁹

承上所述，就Dunne的見解而論，從康德以降至今，國際關係之自由主義概可分成自由國際主義、理想主義、自由制度主義、新自由國際主義(後均以新自由主義簡稱之)、新理想主義以及新自由制度主義，然後三者乃是國際關係之自由主義者為因應全球化的國際新情勢，而對前三者之理論內涵進行相對應之修改而來者。然如此國際關係之自由主義的流派之發展關係系絡，概可從「圖1 國際關係之自由主義學派的發展系絡」清楚得知。

基本上，前所論及之自由國際主義主要是以康德之後的十八世紀與十九世紀的政治哲學中，古典自由主義者對於探究國際關係方面之相關論述，然為有別於政治哲學之古典自由主義(classical liberalism)與二十世紀以後之國際關係自

8 Timothy Dunne, "Liberalism," in John Baylis and Steve Smith eds., *The Globalization of World Politics: An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149-54.

9 Ibid., pp.155-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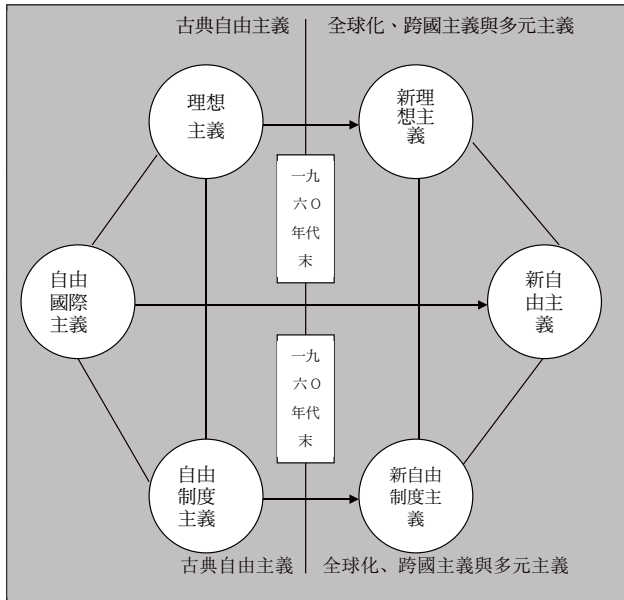


圖1 國際關係之自由主義理論的發展系絡

資料來源：Timothy Dunne, "Liberalism," in John Baylis and Steve Smith eds., *The Globalization of World Politics: An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149-54; 林宗達自行整理繪製。

由主義理論的相關學派，特別是新自由主義，故而均以Dunne所標示之自由國際主義稱之。亦即言，本章與本書所論之自由國際主義，就是代表十八至十九世紀之古典自由主義的國際關係理論。

綜觀而論，國際關係自由主義理論之思想淵源，最遠可追溯至兩千多年前之柏拉圖與亞里斯多德，而十七世紀以降之格老秀斯(Hugo Grotius)、霍布斯(Thomas Hobbes)、洛克(John Locke)、孟德斯鳩(Baron de Montesquieu)與盧梭(Jean Rousseau)等古典自由主義者之相關政治思想，則亦是較為人所熟知者。然而不論是回溯至兩千多年前之古希臘時期的柏拉

圖和亞里斯多德，或者是以十七世紀格老秀斯以後的古典自由主義之論，無可置疑的是，古典自由主義之政治思想家-康德，則是將古典自由主義之政治思想，最有系統地聯結至國際關係以及據此進行深入探討國際關係的思想家，從而成了自由國際主義的領航者，為國際關係自由主義的相關理論開啟了一條康莊大道，成為在當代國際關係理論中，可以與歷史悠久之現實主義並駕齊驅的重要典範(paradigm)。

思想淵源-古典自由主義的政治哲學觀

自由國際主義之思想淵源甚久，或將其追溯至兩千多年前古希臘時期的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故而以下將探究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以降之古典自由主義者對道德與正義、國際法、自由經濟以及民主與共和政體等政治觀。蓋此等政治觀不僅對十八世紀與十九世紀康德等自由國際主義之論具有相當重要的影響，亦深刻地影響二十世紀以後之國際關係自由主義學派之各個流派的相關理論。

一、道德、人性與正義觀

相對於國際關係古典現實主義(classical realism)之性惡與國家的非道德觀，柏拉圖與亞里斯多德以降之古典自由者則有極為迥異的見解，而提出性善說以及強調國家道德的重要性之論，進而將此與正義進行聯結。

古典自由主義之先驅-柏拉圖，甚為



重視道德在政治上的重要性，其認為道德不僅為個人所應有，更是理想國家所必備者。就此而論，柏拉圖將正義(justice，或稱為公道)視為是最高的道德，至善的境界，亦是國家目的實現之所在。然何為「正義」？就柏拉圖的理想國之論而言，正義就是「人人各盡己任，各有己物」。基本上，柏拉圖在政治上相當講究統治者、衛國者與生產者之分工與各司其職，因而其對正義之要求即是分工合作的有效性與整體性之和諧。¹⁰蓋柏拉圖認為國家的目的不僅僅在於獲取正義(公道)，更為重要的是要能夠實行正義，如若不然，則國家會日漸腐化，終至敗亡。相對的，一個國家如能使全民各盡本分，各司其職，達到公平的比例平等，從而使得各個階級安分守己，井然有序，則此國家即可永保長存。¹¹

至於個人，柏拉圖認為其亦只是國家道德的縮寫。個人的道德亦即是智慧、勇敢、節制與統合全德之正義。個人之正義與美善，就是身心各部秩序之調和，如此個人正義之德，乃是生存與發展的憑藉。相反的，一切罪惡之源，就是身心

各部門秩序之不和諧。¹²故就柏拉圖的道德觀而言，其將公共道德(public morality)與個人道德(private morality)視為是相同而不可區分的。¹³此外，柏拉圖認為藉由政治社群對個人社會化過程與教育之影響，可以壓抑人的邪惡之品行，從而驅使人朝道德之方向前進，然此教育的品格(character of education)，正是理想國所應為者，如此可讓人人都生活於快樂之境域中。¹⁴

綜觀而論，柏拉圖將國家與個人內部之調合運作，視為是正義，而如此之正義乃是最高道德，至善之境界，據此可做為個人與國家生存與發展之最佳與最為重要的依靠。學者遼扶東認為柏拉圖的思想對德國唯心主義之康德與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產生極為深刻的影響。在此影響下，康德與Hegel均將國家視為是一個倫理的實體(ethical entity)，國家之表現就是最高的道德。¹⁵至於因正義所衍生正義之戰的問題，柏拉圖認為必須在確保領土、生命與財產之情況下，由法律認可之權威而宣戰者，才是正義之戰。¹⁶然此，則成了格老秀斯所論國際法中之戰爭

10 遼扶東，〈柏拉圖〉，《西洋政治思想史》(臺北：三民書局，1994)，頁44-5。

11 同上；鄒文海，〈柏拉圖〉，《西洋政治思想史稿》(臺北：三民書局，1989)，頁63。

12 遼扶東，〈柏拉圖〉，《西洋政治思想史》，頁45-6。

13 Kenneth W. Thomas, "Plato," *Fathers of International Thought: The Legacy of Political Theory* (Baton Rouge and London: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32.

14 Julia Annas, "Plato's Ethics," in Gail Fine 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lato*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282-3.

15 遼扶東，〈柏拉圖〉，《西洋政治思想史》，頁62。

16 J. Daryl Charles, "Just-War Thinking in Ancient and Medieval Thought," *Between Pacifism and Jihad: Just War and Christian Tradition* (Bowers Grove, IL: InterVarsity Press, 2005), p.32.

法的重要依據。

至於亞里斯多德則認為「人性止於至善，國家為群體發展之最後目的」。蓋就亞里斯多德的觀點而言，國家是社會之最高組合，然其所追求之目的為「至善」(highest/super good)。因為人之所以異於其他動物，不僅在於人可以言語和表達情感，更重要的是人具有判別是非與善惡之理智能力，而此能力與指引做出正確行為之更為積極的道德相互聯結起來，則能驅使人將良善德性顯之於外，從而實現人想要生活於良善環境之期望。然如此之良善的生活，並非其他社會團體可及，必須藉由國家方能獲取之。¹⁷不過，國家亦需要有良善道德的公民來維繫之，道德公民之于國家的地位，就如同防衛國家安全的戰士一般重要。¹⁸依此，人性、道德與國家發展即成為亞里斯多德對倫理之論的核心。

基本上，與柏拉圖相同的是，亞里斯多德亦相當強調國家道德，認為國家不僅要使人享受最快樂、最完美與最高級的

生活，更為重要的是，除了這些經濟利益與物質生活之安定外，國家還有具有道德意義，「政治社會之所以存在，是以高尚之舉措為其目的，而不只是使人生活在一起，朋比結社為已足」。¹⁹因此，亞里斯多德相當強調國家道德之功用，而認為國家乃是人民之道德結合的團體，要培養人民完善的道德與健全之身心，需從如此之積極層面來消除害人之心，使每個人均具有良善之德性，從而使整個國家成為一個立足于人心善良所組成之道德團體，以達每個人都想要追求幸福(well-being)生活之境界。²⁰故為了維護如此幸福生活之境，以防衛國家與盟友之安全而進行的戰爭，即是正義之戰。²¹

綜觀而論，柏拉圖與亞里斯多德之政治哲學強調人性良善以及國家之正義與道德之倫理觀，以及依此建立的國際關係之論，被當代學者尊崇為古典理想主義(classical idealism)，而與修昔堤底斯的古典現實主義，互別顴頭。²²其實，這兩位古希臘先哲不僅深刻地影響其後之政治思

17 鄒文海，〈亞里斯多德〉，《西洋政治思想史稿》，頁90; John B. Morrall, "The Pursuit of Ideal," Aristotle (London & Bost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77), pp. 107-8.

18 Kenneth W. Thomas, "Aristotle," Fathers of International Thought: The Legacy of Political Theory, p. 41.

19 遼扶東，〈亞裡士多德〉，《西洋政治思想史》，頁73。

20 同上; J.L. Ackrill, "Ethic," Aristotle the Philosopher (Oxford & New York: Clarendon Press, 1981), p. 139.

21 J. Daryl Charles, "Just-War Thinking in Ancient and Medieval Thought," Between Pacifism and Jihad: Just War and Christian Tradition, p. 32.

22 Thomas L. Pangle and Peter J. Ahrendorf, "Classical Idealism: Plato and Aristotle," Justice Among Nations: On the Moral Basis of Power and Peace (Lawrence, Kansas: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1999), pp. 33-50.

想家，亦為近代與現代國際關係之自由主義各學派探究國際關係之重要基礎，尤其是甚為強調人性本善、國家道德與國際正義等對國際關係的作用之理想主義。²³然此，正是這兩位希臘先哲對國際關係理論發展所不可抹滅的重要貢獻。

另外，值得關注的是，受到亞里斯多德之正義原則(principle of justice)的影響，中古世紀的政治思想家聖奧古斯丁(St. Augustine)因此而發展出「正義之戰理論」('just war theory')。聖奧古斯丁認為和平的環境有助於道德之養成，故而為了防衛侵略者之國家安全與和平而戰者，即是「正義之戰」('just war')。然即便正義之戰是悲慘的事件，但有時如此之舉，卻是十分必要的作為。只不過，決定發動戰爭之「戰爭的正義或合法性」(legitimacy or justice of war)，必須要由適當的權威依照維護正義的和平與道德等重要因素，對外正式宣布(formal declaration)後，方能進行之。然就聖奧古斯丁的觀點而論，基督教教會就是決定這個正義之戰的權威者，

因其乃是執行上帝所賦予職責與救贖人的罪惡之所在，這些教會中的神職人員是具有判斷與發動戰爭之智慧者，且其戰爭之行為是塵世國家(聖奧古斯丁將國家分成塵世的國家與神的國家)的和平之舉，「絕對的和平，即如同完美的正義一般」('absolute peace, like perfect justice')，而基督教徒就是為和平而發動正義之戰的戰士，因此上帝會支援這種進行維護和平與獲取和平的正義之戰。²⁴

聖奧古斯丁的「正義之戰理論」不僅影響日後神學家與政治哲學家-阿奎納(St. Thomas Aquinas)與西方基督教之思維，亦深刻地影響康德等自由國際主義與理想主義之相關論述，且其影響力更擴及至當代諸多國家發動戰爭之思維，進而成為具有左右國際安全與和平至巨之重要思想。²⁵後論之格老秀斯的國際法，亦深受此論之影響，而將自衛、護衛財產與懲罰不道德及侵略者等執行國際正義的正義之戰，列為國際法之戰爭權的要項之中。格老秀斯並認為執行正義之戰，不僅是國

23 倪世雄，〈第一次論戰—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當代國際關係理論》(臺北：五南圖書2007)，頁54-63。

24 Charles W. Kegley, "Globalization and the Prospects for Global Governance," *World Politics: Trend and Transformation*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536; Kenneth W. Thomas, "Augustine," *Fathers of International Thought: The Legacy of Political Theory*, pp. 49-50.; J. Daryl Charles, "Just-War Thinking in Ancient and Medieval Thought," *Between Pacifism and Jihad: Just War and Christian Tradition*, pp. 43-4; Thomas L. Pangle and Peter J. Ahrendorf, "The Christian Teaching on Just War," *Justice Among Nations: On the Moral Basis of Power and Peace* (Whitefish, Mont.: Kessinger Publishing, 2004), pp. 76-7; Albert Marrin ed., "The Christian as Warrior," *War and the Christian Conscience: From Augustine to Martin Luther King, Jr.* (Chicago: Henry Regnery Company, 1971), pp. 53-9; Thomas L. Pangle and Peter J. Ahrendorf, "The Christian Teaching on Just War," *Justice Among Nations: On the Moral Basis of Power and Peace*, p. 20.

25 於下頁。

家的權利，且是國家必須要履行的一項義務。²⁶自此之後，保護無辜者、救贖錯誤之舉、懲罰邪惡與防衛對進步之錯誤攻擊等四者，即成為西方的正義之戰的道德觀之重要傳統。²⁷

二、自由經濟與自由貿易論

自由經濟與自由貿易論乃是古典自由主義者-Adam Smith聞名於世的重要論點。儘管Smith並不期待，亦不預測從國際間之自由商業貿易的發展是否會導向和平，但Smith的確曾明白地指出自由

商業貿易的活動，具有增進和平之特性 (traits)。²⁸因為藉由自由貿易的進行，有助於促進國家之間的瞭解，從而提升國際和平之情境，然此卻不一定會導致國際的和平。²⁹如是之論，對自由國際主義者產生重大的影響，進而發展出自由貿易有助於降低戰爭危機的可能性之重要論點。³⁰

就古典自由主義對經濟生活的見解而論，其相當強調物質福利(material welfare)，力求每一個人都能過著不會為物質匱乏而煩惱的良好生活。³¹然如何達

25 Paul Ramsey, "The Just War According to St August," in Jean Bethke Elshtain ed., *Just War Theory* (Oxford, UK: Basil Blackwell Ltd., 1992), pp. 10-20; Mark Evans, "Moral Theory and the Idea of a Just War," Mark Evans ed., *Just War Theory: A Reappraisal* (Edinburgh, UK: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1-21; David Boucher, "Christian Natural Law: A Universal Morality," *The Limits of Ethic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atural Law, Natural Rights, and Human Rights Transition*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46-7; Thomas L. Pangle and Peter J. Ahrendorf, "The Christina Teaching on Just War," *Justice Among Nations: On the Moral Basis of Power and Peace*, pp. 73-124.

26 Evan Luard ed. "The Nature of States," *Basic Text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asingstoke, Hampshire & London: Macmillan Academic and Professional Ltd., 1992), pp. 149-50; Renee Jeffery, "Grotius on the Rights of War and Peace," *Hugo Grotius in International Thought*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6), pp. 31-3; Thomas L. Pangle and Peter J. Ahrendorf, "Modern Idealism: From the Grotian Law of Nations to Kantia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Justice Among Nations: On the Moral Basis of Power and Peace*, pp. 162-7.

27 James Turner Johnson, "Threats, Values, and Defense: Does the Defense of Values by Force Remain a Moral Possibility?" Jean Bethke Elshtain ed., *Just War Theory*, pp. 57-60.

28 Edwin van de Haar, "Smith, War, and Commerce," *Classical Liberal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New York: Palgrave, 2009), p. 66.

29 Deepak Lal, "From Laissez Fair to the Dirigiste Dogma," *Reviving the Invisible Hand: The Case for Classical Liberalism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Princeton &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48.

30 Neil R. Richardson, "International Trade as a Force for Peace," in Charles W. Kegley Jr. ed., *Controversi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Realism and The Neoliberal Challenge*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5), pp. 284-5.

31 Ludwig von Mises, "Introduction," *Liberalism: The Classical Tradition* (Indianapolis, Indiana: Liberty Fund, Inc., 2005), pp. xix-xx.

成之？諸如Smith與David Hume等古典自由主義者都認為自由的經濟制度，乃是實現上述良好生活的最佳之道。蓋Smith與Hume等從理性行為體(rational actor)會極大化效益與「利益的和諧」('harmony of interest')之假定著手，並據此而論，在自由市場經濟之下，經由價格機制(price mechanism)之勞力分工與知識分工，可以驅使個人變得更有理性。然如此之專業化(specialization)的自由市場經濟，不僅可以使社會資源擁有較佳的分配情況，亦可使國家獲取較多的財富。³²因此，無論從個人獲利與國家財富的積累而言，古典自由主義均強調國家應該採取放任的自由經濟制度，而在此制度中，國家所扮演的角色應該是「夜間護衛者」('the night watchman state')。³³

另外，古典自由主義者Smith認為必須藉助自由經濟的制度，儘量減低國家對經濟活動的束縛。基本上，經濟活動之進行，應該由無形之「看不見的手」(invisible hand)來導引之，讓個人自利在自由經濟的活動之下，經由追求利潤與勞動分工之自利性的驅使，來極大化經濟效

益。然國家的利益，就是每一個人之利益的積累。因此，就Smith的見解而論，累積每一個個人之經濟利益，即是國家之經濟利益。³⁴

事實上，Smith之自由經濟理念不僅強調國家要儘量降低對國內經濟活動的干預，即使在國際貿易活動上，國家亦應採取非干預(non-intervention)的立場，使人民的貿易活動可以遍及全世界，創造世界成為一個自由經濟與自由貿易的自由市場。然此不僅有利和有助於人民物質福利之經濟生活以及提升世界各地人民的福祉與繁榮，且亦有助於國家之間的和平相處之關係。因為自由貿易乃是消除商業之敵對、懷疑與競爭的有效之道，具有緩和國際政治之強化武力的緊張局勢之作用。相對的，保護主義(protectionism)與設立貿易障礙只會增加國家、人民之間的對立與不和諧的敵對關係，而成為國際衝突的因數。³⁵

基本上，古典自由主義者之自由經濟與自由貿易以及國際關係方面之論，正是從Smith所論之國內的自由放任經濟制度著手，進而向外推展至國家之間的商業

32 Deepak Lal, "From Laissez Fair to the Dirigiste Dogma," *Reviving the Invisible Hand: The Case for Classical Liberalism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pp. 48-9.

33 Ibid., p.48.

34 Scott Burchill, "Progressive Perspective: Liberal Approaches," *The National Interes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New York: Palgrave, 2005), pp. 105-7; Robert P. Kraynak, "Political Philosopher: Hobbes, Thomas," in Seymour Martin Lipset ed., *Political Philosophy* (Washington, D.C: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Inc., 2001), p. 108.

35 Scott Burchill, "Progressive Perspective: Liberal Approaches," *The National Interes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p. 107.

貿易活動，亦是秉持如此之自由放任的經濟原則，強調國家應摒棄干預對外貿易與保護主義作為，而應採取非干預的立場，以使世界貿易暢通無阻。

三、權力分立之共和政體觀

事實上，古典自由主義者強調「法律下的自由」('liberty under the law')，而這種「法律下的自由」，不僅是經濟面向的自由，更需有政治面向的自由。蓋諸如Smith與Hume等英國古典自由主義者都非常清楚政治自由與經濟自由之間的相互支持關係，故而彼等不僅關注經濟自由，亦甚為重視政治自由，並認為個人的自由必須要受到法律與政府的保護，才得以彰顯之。³⁶因為古典自由主義者深刻地瞭解到個人的經濟自由與財產權，此與政治自由的程度是息息相關的，故若是不將霍布斯歸列為古典自由主義者的話，³⁷則可以如此言之，古典自由主義者之主張多是強調不可以產生擁有壓倒性之權力集中的社會，並力主國家權力不完整之權力分散的政治形態，而這種政治形態乃是一種權力分享的政治，然如此之政府的治理則需有執政者與反對者(the Administration and the

Opposition)。³⁸進一步而言，這樣的國家政治形態乃是一個政府權力有限(limits of power)與權力分立(separation of powers)之共和政體(republic system)。就此而論，洛克的相關論述對自由國際主義之民主和平論的影響，乃是較為值得關注者。

洛克之名著，亦是重要的政治理論作品-《政府兩大論》(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此書論及政府統治國家之基礎概有兩者，亦即是第一條約(the First Treaty)與第二條約(the Second Treaty)。前者之第一條約所指的是君權神授之條約，至於後者之第二條約則是指經由人民的理性選擇(rational choice)之下，而將治理政治事務交付給政府和統治者的政治原則。洛克拒斥第一條約之君權神授的政治原則之政府，而倡議第二條約之政府與其統治者是基於人民的同意而治理政治事務之政治原則，並認為這才是人類社會所應有者。³⁹洛克以為第二條約的政府，乃是受到多數人或者是多數的人民代表所同意之依法而治(rule by law)的政府，並且這個政府不僅是一個權力有限之政府，並是一個強調立法優越性(legislative

36 Edwin van de Haar, "Smith, War, and Commerce," *Classical Liberal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p. 58; Deepak Lal, "From Laissez Fair to the Dirigiste Dogma," *Reviving the Invisible Hand: The Case for Classical Liberalism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p. 48.

37 Hobbes是否自由主義者乃是政治學界對政治思想家的定位之最具爭議性的話題之一，對此，前述已有詳論，不再贅言。

38 Michael Oakeshot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Freedom," *Rationalism in Politics and Other Essays* (Indianapolis, Indiana: Liberty Fund, Inc., 1991), p. 388.

39 Nathan Tarcov, "Political Philosophers: Locke, John," in Seymour Martin Lipset ed., *Political Philosophy*, pp. 247-8.

supremacy)之立法權(legislative power)、行政權(executive power)與外交權(foreign power)之權力分立的政府。洛克將此權力分立理論之政府的權力，稱之為「聯邦式的權力」(federal power)，而如此之權力不只具有對內治理政治事務之權，亦有決定包括國家對外之戰爭與和平、聯盟與商業交易等事務之權。值得關注的是，洛克以為只有如此權力分立與有限權力之政府，方能夠保障人民的生命、自由與財產權。⁴⁰

此外，洛克認為權力分立與權力有限的政府，亦是避免君主專權與濫權，以致於避免國家對外發生衝突之道。蓋洛克從英國歷史發展中，得見權力不受限制的君主，因經濟繁榮而腐化，導致其濫用權力而引發內部衝突之社會失序的現象，此時，君主為了維護其權力，轉移內部衝突的注意力，從而有發起對抗外部威脅之衝突行為。因為如此之舉動，有助於降低國家內部衝突的程度。⁴¹儘管洛克的《政府兩大專論》一書中，很難發現其對憲政之

治(constitutionalism)的探討，但政治學者認為無可置疑的是，在洛克的思想中，蘊含著極為深刻的憲政之治的思維，且將這種權力分立與有限權力政府的憲政之治，視為是關係國家安全與和平的重要基礎。⁴²

四、自然狀態觀

霍布斯在1651年出版《巨靈》(Leviathan)一書，其中以人類社會形成之前的「自然狀態」(state of nature)來想像人類生活之實情。霍布斯以為這種自然狀態是一種缺乏確保人類安全之壓倒性權威(overriding authority)，而讓人可以毫無限制追求欲望，為所欲為的狀態。然正因如此，故自然狀態的社會使人陷入持續不斷的衝突之情境中。⁴³至於生活在自然狀態之人，則其不僅具有孤獨與害怕因暴力而死亡之恐懼，以及強烈的自私與貪婪的本性，且擁有相當卑鄙、粗暴無禮與殘酷的個性。⁴⁴故而如此之人所生活的自然狀態，事實上，就是一種戰爭的狀態(state of war)。⁴⁵人生活在這種狀態之中，無論

40 Ibid., pp.249-51.

41 John Dunn, "The State of Nature,"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John Locke: A Historical Account of the Argument of the '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116-9.

42 John Locke, Peter Laslett ed., "Locke and Hobbes," *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78.

43 Colin Elman, "Realism," in Martin Griffiths e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An Introduction*, p. 12; Charles R. Beitz, "The Skepticism of the Realist," *Political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28.

44 Colin Elman, "Realism," Martin Griffiths e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An Introduction*, p. 12.

45 於下頁。

是為了安全、榮譽或者是利益，都會努力地摧毀或抑制其他人，故而會時有人們相互戰鬥('everyman against everyman')之情況發生，雖言戰鬥並非都是一直持續不停的狀況，但武力的對抗卻是永無休止的。⁴⁶因此，國家存在之主要目的，就是為了保護人民在自然狀態中之安全，以免其受到戰爭之威脅。⁴⁷

霍布斯的自然狀態之論，明顯地影響國際關係的現實主義甚為深刻，但實際上，除了現實主義之外，即使國際關係之自由主義，亦頗受其影響。基本上，就自然狀態之論而言，理想主義則是較傾向於接受的是洛克的自然狀態之論。然洛克與霍布斯對自然狀態之論則是南轅北轍，呈現出兩個相當迥異之論。

洛克強烈地攻擊霍布斯的自然狀態之論，認為所謂的自然狀態呈現的景象並非如霍布斯所言之充滿暴力，人人相互為敵的戰爭狀態，相對的，自然狀態乃是

一種「和平、良善意志、相互支持與受保護」('peace, good will, mutual assistance, and preservation')的狀態。⁴⁸自然狀態之下的所有人是平等與自由的，且在人的理性之限制下，每一個人可以經由自我的勞力而非神的幫助，獲取財產。人亦會依循自然法而尊敬他人之私有財產，而不會有逾越自然法的規範之舉。⁴⁹總而言之，洛克之自然狀態乃是一個在自然法規約定下之完全平等、自由、互惠與和平之狀態，任何人之行為均受自然法之規範，而每一個人都有權利處罰違反自然法之規範者。⁵⁰儘管洛克對自然狀態之組織性的論述，遠不如霍布斯，不過學者Kenneth W. Thompson認為國際關係之理想主義從洛克對自然狀態之論中，確認其對人與國際社會之信念(belief)，並依照洛克如此之論而發展其國際關係之理想主義的理論。⁵¹不僅如此，事實上，從前述之論中亦可見康德的自由國際主義，雖然理解霍布斯的

45 Vickie B. Sullivan, "Hobbes on Peace, the Passions, and Politics," Machiavelli, Hobbes, and the Formation of a Liberal Republicanism in Engl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83-4.

46 Jack Donnelly, "The Realist Tradition," Real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14; Michael William, "The Hobbesian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ree Traditions," Beate Jahn ed., Classical Theor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360-1.

47 Vickie B. Sullivan, "Hobbes on Peace, the Passions, and Politics," Machiavelli, Hobbes, and the Formation of a Liberal Republicanism in England, p.83.

48 Kenneth W. Thompso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Fathers of International Thought: The Legacy of Political Theory, p. 81.

49 Nathan Tarcov, "Political Philosophers: Locke, John," in Seymour Martin Lipset ed., Political Philosophy, pp. 247-8.

50 John Locke, Peter Laslett ed., "The Second Treaties," Two Treaties of Government, pp.269-78.

51 於下頁。

自然狀態對國際社會的影響之說，但其國際社會的自然狀態卻擁有不少洛克對自然狀態的和平與互惠等論之內涵。故可如此言之，霍布斯的自然狀態之論，深刻地影響現實主義之理論的發展，亦影響了新自由主義與新自由制度主義，但洛克的自然狀態之論對理想主義的影響最深，至於自由國際主義則應是在霍布斯和洛克等兩者之論的影響下而發展者。

主要論點

Bruce Russett與John O'neal認為康德的自由國際主義論，主要在於論述國際和平的創建與維繫，然在此之中，民主(democracy)、經濟互賴(economic interdependence)與國際組織(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與其彼此之間的相互支持關係(如圖2)，堪稱是康德國際和平論的三大支柱。⁵²儘管如此，但國家道德與國際正義論亦為自由國際主義理論之重要論點。因此，吾等若欲了解自由國際主義理論之概略，則至少必須檢視自由國際主義之理論家對自由貿易之國際和平論、民主政治之國際和平論、以及國家道德與國際正義論等三者之論。

一、自由貿易之國際和平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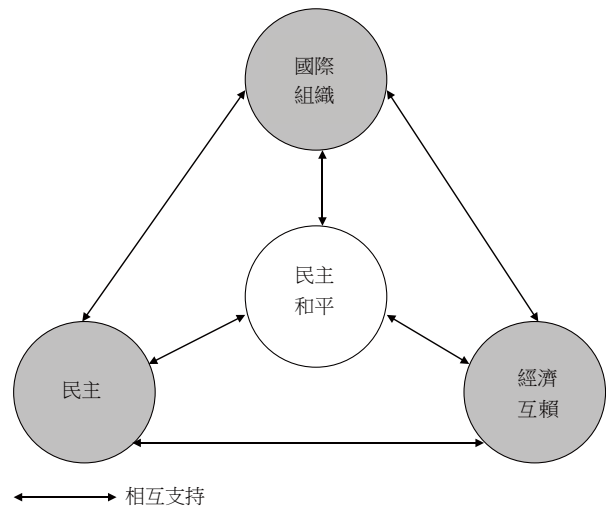


圖2 康德的國際和平論

資料來源：Bruce Russett and John O'neall, "International Systems: Vicious Circles and Virtuous Circles," *Triangulating Peace: Democracy, Interdependence,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2001), pp. 35-42.

自由貿易之國際和平論是自由國際主義之相當重要的理念與論點。自由國際主義相信藉由國家與國家之間的自由貿易(free trade)與自由交易(free exchange)，可讓每一個國家之生產與其所提供之物品的潛在價值，達到物盡其用，貨暢其流之目的，提升進行自由貿易與自由交易之國家的相互獲益(mutual gain)，⁵³進而將國家引入勞力分工之相互依賴(interdependence)以及增加財富之境，此乃是降低國家之間

51 Kenneth W. Thompso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Fathers of International Thought: The Legacy of Political Theory*, p. 82.

52 Bruce Russett and John O'neall, "International Systems: Vicious Circles and Virtuous Circles," *Triangulating Peace: Democracy, Interdependence,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2001), pp. 35-42.

53 Joshua S. Goldstein,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Harper-Collins College Publishers, 1996), p. 8.

發生衝突之可能性與持續促進國際和平之良方。⁵⁴然此，亦是自由國際主義大師康德，藉以論述國際和平之重要基礎。

基本上，自由國際主義理論之核心即在於論述國際之合作與和平的可能性是如何達成者，然此為自由國際主義領航者康德所著《永久和平》(Perpetual Peace)一書的重點。

學者Joshua S. Goldstein和Jon C. Pevehouse認為在200多年前，康德在《永久和平》一書中，即已提出三個可做為解答如何達成國際合作與和平之重要論點：⁵⁵

其一，基於互惠原則(reciprocity principle)，國家應發展國際組織與規則(organization and rules)，以促進國際合作。

其二，國際和平有賴於政府內部之特質，亦即是民主政治之共和政體。因為，民主政治之權力分立與制衡之設計，要比獨裁政治更有利於國際和平之發展。

其三，貿易有助於國際和平之推展。此乃是立足于貿易增加財富、合作與全球之福祉，使國際之間的衝突可能性大

幅降低。因為，就長期而言，任何政府都不希望在增加國家財富的過程中，受到國際衝突的干擾。

承前所論，康德反對國際合作與和平之天真的思維(naive thinking)，認為國際和平並非是自然存在之情況，並且國家之間更非是毫無爭執者，相反的，和平需要每一個國家共同努力追求與加以維繫者。⁵⁶就此而論，康德認為國際和平不會是先天就有的，更非是自動形成的，而必須是後天人為之努力，方能獲取者。因此，康德經由較為嚴謹的邏輯思考、推理與論述，建構出國際合作與和平的「永久和平論」。然在此之中，康德將自由貿易對國際和平之作用，置於最為優先之地位。其以為國際間之自由貿易會提升各國境內之經濟發展，而如此之經濟發展又會促進民主制度之形成，然在越來越多國家變成民主國家之際，則國際關係就會趨向穩定與和平。⁵⁷

綜合康德對自由貿易之國際和平論可知，自由貿易不僅具有直接促進和維繫國際和平之作用，亦有透過對民主制度的形成與支持之作用，而後再影響國際和平

54 Jill Steans, Lloyd Pettiford, and Thomas Diez, "Liberalism,"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 New York: Pearson Education Ltd., 2005), p. 27; Ludwig von Mises, "The Foundation of Liberal Policy," Liberalism: The Classical Tradition, p. 7.

55 Joshua S. Goldstein and Jon C. Pevehouse, "Alternatives to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84-5.

56 盧業中，〈國際關係學之自由主義的理論〉，明居正主編，《國際關係綜論》，頁95。

57 G. John Ikenberry, "America's Liberal Grand Strategy: Democracy and National Security in the Post-War Era," in G. John Ikenberry e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Theoretical Essays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2002), p. 277.

之效果。然自由貿易之所以具有促進與維繫國際和平，最主要在於國家之間進行自由貿易，可以產生兩個對國際和平產生的關鍵性作用：一是加強國家之間的相互依賴關係，從而促進與維繫國際和平；另一為提升經濟發展與增加財富，導致民主政治制度的產生，進而促使與維繫國際和平。

據此，吾人將其繪製成「圖3 康德之永久和平論的自由貿易與國際和平之關係」，以為說明。

康德的自由貿易之國際和平論，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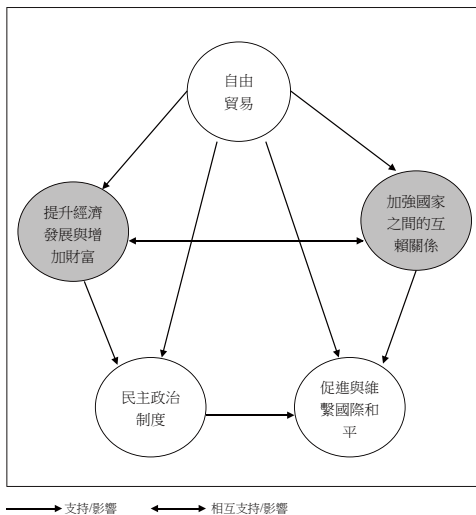


圖3 康德之永久和平論的自由貿易與國際和平之關係
林宗達自行整理繪製

刻地影響此後自由國際主義者對促進與維繫國際和平之見解，使其後續者得已提出更為深入之論，以為補充與支持康德之論。

首先，就自由貿易之加強國家之間的互賴關係，從而促進與維繫國際和平而論。自由國際主義者之經濟觀不僅強調國內經濟均是處於勞力分工之相互依賴的經濟型態，然如此之情況，亦是國際經濟所應有的型態，據此，才能增進國家經濟發展之效益。而經由國際經濟之分工與互賴的自由貿易關係，則人類會因物質的互賴關係，而形成更為緊密之結合，如此情況，則會提升發動戰爭和國際衝突的代價，大幅限制戰爭與軍事衝突之舉，從而間接地產生諸如和平、繁榮與正義等宏觀層次的產物(macrolevel goods)。對此，自由國際主義者David Ricardo認為自由貿易有助於將文明世界的國家與社會之利益和交流(intercourse)更緊密地聯結在一起；至於邊沁、John Stuart Mill和Cobden等則認為國際繁榮、和平與合作都是自由貿易之下的產物。⁵⁸ Mill甚至還認為自由國際貿易之經濟作為，必能將戰爭拋進於歷史的塵埃之中。⁵⁹

58 Mark W. Zacher and Richard A. Matthew, "Liberal International Theory: Common Threads, Divergent Strands," in Charles W. Kegley, Jr. ed., *Controversi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Realism and the Neoliberalism Challenge*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114; Peter Wilson, "Liberal Institutionalism, Anticapitalism, and Consumers' Co-operations: Toward a Nonstate, Nonmarket Approach to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ganization" *The International Theory of Leonard Woolf*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p. 147.

59 John Mueller, "The Rise of Peace Advocacy before World War I," *Retreat From Doomsday: The Obsolescence of Major War* (New York: Basic Books Inc., 1988), p. 27.

另外，J. A. Hobson這個被視為是帝國主義(imperialism)先鋒之自由國際主義者，則從批判當時資本主義國家(capitalist state)為擴張經濟勢力的帝國主義(imperialism)之自由貿易型態著手，認為這種帝國主義的自由貿易乃是在帝國主義國家之掌控下而進行的，然如此之貿易型態不僅會加大國家之間的貧富懸殊與經濟發展機會之不平等，更會使帝國主義國家為擴張經濟勢力，而必須將所獲取的經濟利益用之於加強軍備，以做為其擴展殖民地的經濟勢力之憑藉。然對帝國主義國家而言，如此之作為，反而是得不償失之舉。因此，Hobson反對這種受到帝國主義式國家干預之損人不利己的自由國際貿易，而強調重回不受國家干預之自由國際貿易的型態，如此才是對人類社會之繁榮與國際和平具有正面貢獻的國際經濟型態。⁶⁰

對此，事實上，Cobden和邊沁亦相同之見解，並認為要達成國際和平之最為首要的步驟有二：一是在經濟上要進行殖民地之解放的作為；二為促成裁軍協議。蓋軍備建構與權力平衡的策略，並非維護國家安全之良方，相對的，採取互蒙其利之和平商業的自由貿易政策，推進國家之間的相互依賴，才是維護國際和平的最佳之道。⁶¹而英國的另一位自由國際主義者-John Bright，也主張採取非干預之「自由放任」的國際經濟政策，認為如此之國際經濟型將會導致國家財富之增加與國際繁榮度的提升，而有助於全球和平(global peace)之發展。⁶²簡而論之，就康德以降之自由國際主義者的觀點來看，自由貿易為世界經濟長期發展的最佳政策，更是國際和平與繁榮的重要基礎。⁶³

其次，就提升經濟發展與增加財富，導致民主政治制度的產生，進而促

60 Peter Cain, "Becoming an Anti-Imperialist, 1887-1898," Hobson and Imperialism: Radicalism, New Liberalism, and Finance 1887-1938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4 7-80; David Long, "Economic Internationalism," Towards A New Liberal Internationalism: The International Theory of J.A. Hobs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123-6.

61 Gunhild Hoogensen, "Bentham on Peac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ecurity and Jeremy Bentham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pp. 82-3; Per A. Hammarlund, "The Obsolete International System," Liberal Internationalism and the Decline of the State: The Thought of Richard Cobden, David Mitrany, and Kenichi Ohma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p. 54-60; Per A. Hammarlund, "The Case Against the Nation-State System," Liberal Internationalism and the Decline of the State: The Thought of Richard Cobden, David Mitrany, and Kenichi Ohmae, pp. 118-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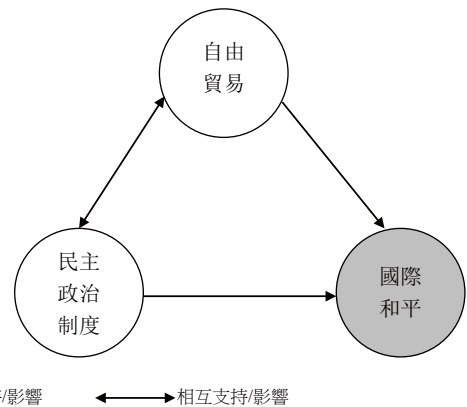
62 John S. Partington, "Liberal Internationalism, 'Ethical Evolution' and Cosmopolitan Socialism," Building Cosmopolis: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H.G. Wells (Burlington, VT: 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 2003), p. 23.

63 David Long, "Economic Internationalism," Towards A New Liberal Internationalism: The International Theory of J.A. Hobson, pp. 123-6.

使與維繫國際和平來看。邊沁、Mill和Cobden等自由國際主義者雖認為自由貿易有助於個人私有財產的累積，亦是個人進步成長的動力，且此亦有助於政治之民主化之推展。⁶⁴不過，值得關注的是，彼等認為不論是個人的自由(liberty)或自由貿易，相對的，這些都需要民主政治制度的支援才行。⁶⁵這與Smith等古典自由主義者認為包括財產自由等自由權，唯有在自由政體以及法律的保障之下，才可避免受到侵害之觀點相符，可說是一脈相承之論。⁶⁶故由此論之，自由貿易對民主政治制度具有正面的影響力，而民主政治制度則是自由貿易的保障，因而自由貿易與民主政治制度之相互支援的作用，乃是促進與維繫國際和平之至關重要的因素。然此三者之關係，概可由「圖4 自由貿易、民主政治制度與國際和平之關係」得見之。至於民主政治制度對個人自由權利之維護，則詳見於後。

二、民主政治之國際和平論

十八世紀與十九世紀的自由國際主義者認為國際衝突與戰爭之問題，並非是不可解決者，然要解決如此之問題，主要在於民主與自由貿易。⁶⁷



林宗達自行整理繪製

圖4 自由貿易、民主政治制度與國際和平之關係
林宗達自行整理繪製

受到洛克等古典自由主義者之民主觀念的影響，自由國際主義者相信唯有在民主政治體制之下，人民的權利方能獲得保障，個人的自由才得以展現。然透過民主之權力分立與政府權力有限之機制，可以讓人民擁有箝制政府對外發動戰爭之權力，而此卻是維繫國際和平之最為重要的力量。亦可如此言之，受到民主機制保障之人民權利，不僅是局限政府權力之運用的關鍵，更是促進和維繫國際和平的重要基礎。康德等自由國際主義者即是在如此之思維下，建構其國際關係之民主和平論。⁶⁸

康德認為人民的權利唯有在受到依

64 Mark W. Zacher and Richard A. Matthew, "Liberal International Theory: Common Threads, Divergent Strands," in Charles W. Kegley, Jr. ed., *Controversi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Realism and the Neoliberalism Challenge*, p. 114.

65 Ibid.

66 David Conway, "Classical Liberalism," *Classical Liberalism: The Unvanquished Ideal* (New York: Macmillan Press Ltd., 1995), pp. 8-13.

67 Scott Burchill, "Progressive Perspective: Liberal Approaches," *The National Interes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pp. 112-3.

68 於下頁。

法而治之民主體制的共和國，才可受到確切之保障，而不會受到侵害。⁶⁹然國內政治機制對人民權利之保障，何以會對國際關係之戰爭與和平產生作用，從而成為促進與維繫國際和平之力量？自由國際主義者認為此主要在於對政府之權力，包括對發動戰爭之權力，乃是有所限制之故。

蓋就康德的見解而論，在君主專制的政治體制下，君主會因攫取個人利益，可以不顧及是否會因其利益與對外發動戰爭，致使人民遭受災害之舉。但相反的，在依法而治之共和政體中，由於權力制衡(check and balance of powers)與權力分立，都是建立在人民政治權利的基礎而來者，然基於戰爭與和平直接關係到人民之個別利益至巨，因此，人民對發動戰爭這等大事，都是特別慎重，而會謹慎評估之，絕不可能會輕易地支持政府發動戰爭之作為。故而透過人民權利對政府運用權力之局限，可以約束政府對外發動戰爭之舉。⁷⁰至於邊沁則認為政府官員的作為必須受到人民的監督與評判，並且人民應該

擁有對國家之軍事戰略與防衛計畫進行投票的認可之權，以防止政府官員專斷而影響國家安全，然此乃是民主政治所不可或缺者。⁷¹

基本上，康德與邊沁等自由國際主義者的民主政治之國際和平論的思維，其要旨在於建立民主政治體制之依法而治，規範政府必須保障人民之權利與人民對政府權力運用之限制的基礎之下，即可以對國際和平之推展與維繫產生正面的作用。⁷²然如此之思維，概可從「圖5 自由國際主義者之民主政治的國際和平論之思維」得見之。

三、國家道德與國際正義論

不同於古典現實主義的國際關係之無政府與無秩序、安全困境與權力競逐之國際社會是弱肉強食以及國家之非道德觀，自由國際主義對此則有相當不同的見解。主張世界一家規劃(cosmopolitan project)的自由國際主義者認為國家對外必須講究道德原則，因為道德原則有助於提升國家獲取利益的合理性，並據此做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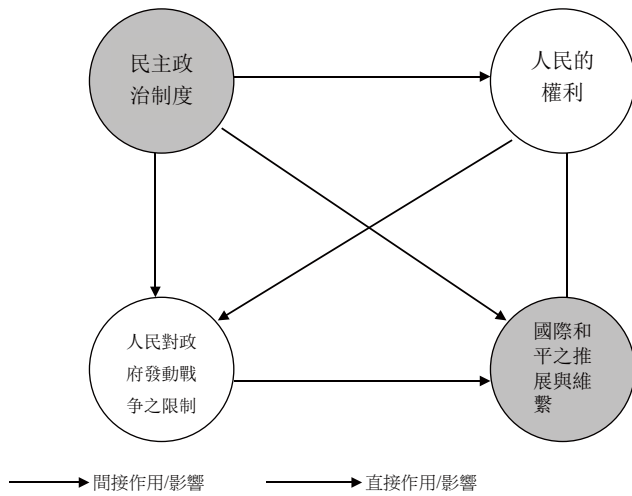
68 Scott Burchill, "Liberalism," in Scott Burchill, Andrew Linklater, Richard Devetak, Jack Donnelly, Terry Nardin, Matthew Paterson, Christian Reus-Smit, Jacqui True eds.,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p. 33.

69 Hans Reiss, H.B. Nisbet trans., "Introduction," *Kant's Political Writings* (Cambridge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10.

70 Michael W. Doyle, "Liberalism and World Politic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0 No. 4 (December 1986), pp. 159-60; Kenneth W. Thompso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Fathers of International Thought: The Legacy of Political Theory*, pp. 108-9.

71 Frederick Rosen,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Jeremy Bentham and Representative Democracy: A Study of the Constitutional Cod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112-3.

72 Scott Burchill, "Progressive Perspective: Liberal Approaches," *The National Interes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p. 113.



林宗達整理繪製於2011年3月10日

圖5 自由國際主義者之民主政治的國際和平論之思維

責難其主要競爭者之依據，從而成為形塑世界秩序，推進世界進步之重要基礎。⁷³至於國際正義，自由國際主義則將此視為是尊重主權國家之權利、和平的國際關係、公平的規則以及公平規則之運作。⁷⁴依此，以下將進一步地論述自由國際主義之國家道德與國際正義論。

首先，就國家道德而言。自由國際主義大師-康德，相當重視道德，認為道德不僅可用之於個人，亦可用之於社會關係，政治架構都是立足於道德法則(moral

law)之社會關係的基礎之下而形成者，故而即使是國際關係，亦不能將道德排除在外。康德更從理性的角度，而論國際道德之所以成為國家必要之行的原因。⁷⁵

康德以為基於理性適切的作用之故，道德就是在良善意志的運作之下，而做出對的事情的。然在政治領域方面，人並無法經由良善的本質做出道德之行，而需藉由適當地建構政治與法律秩序，來驅使人們做出道德之舉，進而使得世界可以受到道德法則之治理。蓋就康德的道德觀而言，無論是人或國家，雖都有道德之潛質，然若無良善的政治與法律秩序之規範，則不免會有逾越道德之舉，從而可能有破壞國內秩序與國際和平之情事。因此，康德強調必須建立依法而治之民主政治體制的共和國，以促進國際和平，然後有所謂「民主和平論」。⁷⁶然除了民主政治體制之外，康德認為應要建立可以做為國家行為之規範的世界法，以及由民主體制國家所形成之國際制度-聯盟，以做為促進和維繫國際和平之憑藉。⁷⁷

康德從國內(法治的民主政治制度)至國際(世界法與民主國家聯盟)建立起一套

73 Andrew Linklater, "Rationalism," Scott Burchill, Andrew Linklater, Richard Devetak, Jack Donnelly, Terry Nardin, Matthew Paterson, Christian Reus-Smit, Jacqui True eds.,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 103.

74 Chris Brown, "Introduction: Sovereignty, Rights and Justice," *Sovereignty, Rights and Justic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Theory Today* (Cambridge, UK & Malden, MA: Polity Press, 2005), p. 9.

75 Ibid., pp. 42-3.

76 Ibid., pp.44-5.

77 Michael W. Doyle, "Liberalism and World Politic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pp. 1160-1; Ian Clark, "Kant and the Tradition of Optimism," *The Hierarchy of States: Reform and Resistance in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New York & Sydne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 54-5.

由內至外的法律和政治秩序，做為規約個人與國家遵行道德之行的依據與憑藉。亦即言，道德必須在法的制約下，才得以成形，並付諸實行。然此，正是康德所以強調國際法之故。蓋在理性的驅使下，人依據理性而不會有違法的道德之舉，以獲取利益，這才是人與國家之所以會有尊從道德法則，進而有道德行為的重點之所在。

⁷⁸因此，學者Chris Brown認為康德所論之國家與個人的道德行為之舉，都是基於理性與法律規範作用下之選擇性的作為。脫離法律與政治秩序之外，就難以確保國家與個人不會做出逾越道德之舉。⁷⁹然康德如此之論，或有可能嚴重地混淆法律與道德之問題。不過，若仔細探究就可得知，康德的見解為無論是國家或個人之行為均應遵循法律，而非道德，人與國家都應有遵循法律之道德責任。而就康德之法律與道德關係來看，這是一種以法律形塑人之道德心的內在主義者(internalist)之論。⁸⁰

事實上，自由國際主義對國家道德之關注者，除了康德之外，還有Cobden亦是相當重要者。Cobden不僅認為國家必須要有道德之行，更為重要的是，要以道德取代武力。因此，國家應該儘量地減少依賴軍事武力之不必要的浪費，而要對其他國家表現出良好意圖之舉，做為護衛國家安全之憑藉。⁸¹

其次，就國際正義而論。儘管康德對國際正義論，並未如個人與國家道德論之如此深入，然從前述之國際正義為自由國際主義視為是尊重主權國家之權利、和平的國際關係、公平的規則以及公平規則之運作的界說，以及自由國際主義強調個人與國家道德，從而彰顯出國際道德法則來規範國家行為之舉，⁸²而認為國家可以為防衛其權利與利益(rights and interests)，發動戰爭，以對抗任何侵犯者之論。⁸³或論據此可以想見的是，康德對於違反國際道德法則之規範，而侵害他國之

78 Edwin van de Haar, "Liberalism and IR Theory," Classical Liberalism and IR Theory: Hume, Smith, Mises, and Hayek, pp. 126-7; Kenneth W. Thompso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Fathers of International Thought: The Legacy of Political Theory, p. 106.

79 Chris Brown, "Enlightenment and Post-Enlightenment Thought," Sovereignty, Rights and Justic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Theory Today, pp. 44-6.

80 Kenneth W. Thomas, "The Nineteenth Century," Fathers of International Thought: The Legacy of Political Theory, pp. 109-10; John Ladd, "Law and Morality: Internalism vs. Externalism," Law and Philosophy: A Symposium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64), pp. 61-2.

81 Per A. Hammarlund, "The Case Against the Nation-State System," Liberal Internationalism and the Decline of the State: The Thought of Richard Cobden, David Mitrany, and Kenichi Ohmae, p.118.

82 Hedley Bull, "Martin Wight and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Gabriel Wight, Brian Porter, and Hedley Bull eds., International Theory: The Three Traditions (Leicester and London: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xii.

83 於下頁。

權利者，視為是不正義之行為，而強調道德之國家與國際社會應反制之，即使訴諸戰爭，亦不為過。且如此之舉，不僅未有違背國家道德，更是國際正義之所在。⁸⁴

另外，Cobden這位自由國際主義者雖然未甚為詳細明確的國際正義之論，不過，如同康德一般，其亦認為國際社會並非是弱肉強食的社會，而是立足於一個普遍國家道德之下而來者。Cobden更將基督教的倫理聯結至其對國際正義的認知之上，認為國家不僅要有道德之行，且有義務(duty)對抗違反道德者。⁸⁵然就此而言，Cobden將道德視為是國家與國際社會所不可或缺者，所以凡是違反道德之國家者，任一道德國家均應義無反顧對抗之，採取衛道護德之舉，然如此正義之行，即是國際正義之所在。⁸⁶

結語

藉由對自由國際主義之思想淵源、主要假定、主要論點以及問題與批評等論，吾人提出以下幾點觀察，作為對自由國際主義之論的結論。

第一，政治哲學的探討更勝於國際實務與經驗之研究的規範性理論

(normative theory)。從對自由國際主義之主要論點的探究中，吾等可以清楚且明白地瞭解到自由國際主義是一個政治哲學的探討而更勝於對國際實務與經驗之研究的國際關係理論，而如此之理論，只探求國際關係的應然發展，而非解釋國際之實然現象者。

第二，著重第二形貌之國際政治分析的理論。國際政治學者Kenneth N. Waltz在其名著《人、國家與戰爭》(Man, the State and War)一書中，提出國際政治分析之三大依據，此即是以人為第一形貌(the first image)、以國家的本質為第二形貌(the second image)與以國際體系為第三形貌(the third image)等三項依據。⁸⁷不論是從自由貿易之國際和平論、民主政治之國際和平論、國際法制之國際和平論以及國家道德與國際正義論等四大論點來看，基於自由國際主義強調基於互惠原則，國家應發展國際組織與規則，以促進國際合作，以及國際和平有賴於政府內部之特質，亦即是民主政治之共和政體。並對違反國際道德法則之規範，而侵害他國之權利者，均可視為是不正義之行為，而強調道德之國家與國際社會應反制之，即使訴

83 Charles Covell, "The Preliminary of Perpetual Peace," Kant and the Law of Peace: A Study in the Philosophy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 107.

84 W.B. Gallie, "Kant on Perpetual Peace," Philosophers of Peace and War (London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pp. 21-7.

85 Per A. Hammarlund, "The Case Against the Nation-State System," Liberal Internationalism and the Decline of the State: The Thought of Richard Cobden, David Mitrany, and Kenichi Ohmae, p. 118.

86 Ibid., pp. 118-21.

87 於下頁。

諸戰爭，亦不為過。且如此之舉，不僅未有違背國家道德，更是國際正義之所在。據此而論，吾等可知自由國際主義乃是一個較為著重國家本質之第二形貌，做為分析和探究國際關係之分析層次的理論。

第三，同中有異。目前我國學者多以康德作為二十世紀前之國際關係自由主義理論的代表，然從上述之探究中可知，十八世紀與十九世紀之國際關係自由主義理論乃是相當豐富的，實非康德一人所能概括之。不僅如此，儘管在此時期中之自由國際主義者，彼等雖有相同之論點，然這些相同的論點之中，仍有些微，甚至於明顯的差異。例如康德與邊沁兩者雖都認同國際法對國際和平之助力，但兩者之論卻有差異。蓋康德的「永久和平論」之國際法乃是立足於國家之自由與獨立的前提之下而創建者，因此，康德認為國家可以為防衛其權利與利益(rights and interests)，發動戰爭，以對抗任何侵犯者。然邊沁則強調國際法之內容應該要尊重各國政府之政治體制，更強調必須藉由溝通之法來解決國家之間分歧的意見與衝突，進而據此作為極大化各國效益，達到國際社會之「最大多數之最大快樂」的目標。故而就理想性的層次而言，邊沁的理

想性要更高於康德。

第四，民主政治制度與理念並非確保國際和平的最佳屏障。從前述對民主政治之國際和平論與其問題的探究中可知，無論就政治理論、政治實務的進行或者是國際實務之經驗，吾等可以清楚地瞭解到，民主政治制度與理念並不能完全地免除民主國家對外發動戰爭，甚至是侵略行動之事實，相對的，自由民主的價值觀，很有可能是強權民主國家以發動戰爭，做為獲取國家利益之「合理又良善」的藉口。

作者簡介

林宗達先生，臺灣大學政治學博士，國際軍務雜誌社長。



87 Kenneth N. Waltz, "The First Image: International Conflict and Human Behavior," "The Second Image: International Conflict and the Internal Structure of States," "The Third Image: International Conflict and Internaitonal Anarchy," Man, the State and Wa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9), pp. 16-41; pp. 80-123; pp. 159-186.